

成都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的性质及成因分析

万 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

十二桥遗址是十二桥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十二桥遗址的分期研究是讨论十二桥文化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一。十二桥遗址 F1 毁于洪水是考古学界的推测,十二桥遗址在埋藏过程中可能受到洪水的干扰是研究者心中的疑问。但研究者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析上,并未深入探讨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事实上,对地层堆积形成过程的认识是我们理解遗址变化的重要参考,而离开现场再去做地层形成过程的复原,比直接的现场分析更缺少证据。鉴于十二桥遗址的重要性和早期堆积的特殊性,笔者对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的性质和成因进行了分析。由于十二桥遗址的发掘已结束多年,很多现象只能依据《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见《文物》1987年第12期,以下简称《简报》)和《成都十二桥》(文物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报告》)中的描述及照片加以分析。本文从分析地层堆积的现象入手提出假设,再从遗迹和遗物方面进行

检验和论证。

一 十二桥遗址概况

1985年12月,成都市干道指挥部在十二桥街之南的新一村修建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的综合大楼,用大型机械挖掘综合大楼地下室时,发现许多陶片和一些圆木构件,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介入后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1986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共同组建十二桥遗址发掘小组,开始对十二桥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十二桥遗址的发掘分为 区和 区,其中 T25 之外的 区探方和 区东部统一分为 13 层。第⑨层出有釜形鼎、矮圈足豆等,年代已至战国。第⑩层以下,尖底器较多,判断为商周时期遗存,属十二桥文化早期。第⑫层下叠压木结构建筑遗迹。第⑬层为建筑倒塌形成的堆积,其下叠压木结构建筑的木桩基础遗迹,为了保护木结构建筑及其构件,未进行发掘。

二 《报告》关于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成因的分析

关于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形成的原因,《报告》编写者认为是“洪水冲毁了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倒塌后形成了现在的埋藏情况”^[1],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建筑木构件在区 T6~T9 中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木构件一致的走向中又存在一条略带弧形的通道,仔细观察这条略带弧形的通道可以看出其与洪水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木构件就顺着这条弧形通道发生了位置移动,形成木构件沿着这条弧形通道分布的原因,推测与洪水有关^[2]。

第二,如此多的木构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遗址中又保存了许多木建筑屋顶的茅草和作为墙体的编制茅草遗迹,且保存状况较好,因此可以完全排除火灾造成木结构建筑倒塌的可能性^[3]。

第三,结合成都的历史来看,古郫江故道由成都西北九里堤向南流经故城西,至今通惠门折而东流,经西校场、南校场等地,至南河口与南河相汇。今十二桥遗址的位置在西郊河、摸底河与南河之间,正濒临古河道旁,历史上受洪水的侵害是可能的^[4]。

十二桥遗址商周地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是理解十二桥文化分期和发展的关键。《报告》分析中提出了 3 条 F1 毁于洪水的证据,而 3 条证据中,只有第 1 条是直接论述 F1 可能毁于洪水。这样的证据和论证方式仅能支撑提出一个推测,而不能有力地证明 F1 的确是毁于一场洪水。仅利用第 13 层木结构的位置来分析堆积的成因和来水方向是不充分的。因为木结构通过榫卯和竹篾捆绑连为一体,相互牵绊,从木结构建筑的分布图看不出明显的来水方



图一 T16 分布在木结构之间的长条状遗物

向, T16 探方照片显示分布在木结构之间的长条状遗物也没有呈现统一的方向(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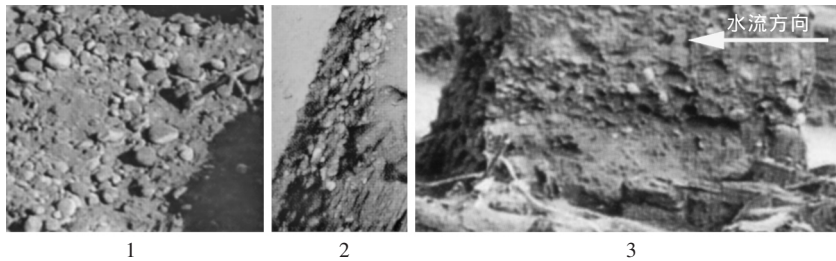
《简报》提到“地层中也明显出现洪水冲积层,出土遗物上也多见洪水冲刷的痕迹”^[5]。但遗憾的是,《简报》未指明哪些地层是洪水冲积层,也未说明地层中出现的洪水冲积层是地层的局部现象还是整体现象。

三 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的特点及成因推测

十二桥遗址毁于洪水说从《简报》发布起,一直是一种主流推测。但关注的重点,一直在第 13 层。F1 是否毁于洪水,仅凭第 13 层的遗迹和遗物是无法说清楚的。《报告》公布后,已有学者意识到,第 13 层与第 12 层的共时性可能存在探讨的空间。如于孟洲对第 12 层究竟是人为形成、人与自然共同形成还是自然形成产生了疑惑,最终认为是人与自然共同形成,似乎自然因素的作用更大^[6]。

由于施工的破坏和 F1 大量保存较好的木建筑构件的吸引,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没有重视第 13 层以上的堆积,也没有对堆积的微结构进行量化分析。现在只能从《报告》的描述和公布的照片中获知大概。对第 12 层堆积的描述有以下几条。

第一, 区 T22 12 层为黄色土,土中包含物



图二 发掘现场

1. T21 砾石堆积状况
2. T19 西壁砾石堆积状况
3. T30 关键柱北面砾石堆积状况

丰富,有大量的砾石、沙、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其下无遗迹,厚 23~44 厘米^[7]。

第二, 区 T30、T40、T50 的地层,第⑫层为黄色土,含大量的砾石,厚 8~54 厘米^[8]。

第三,《报告》提到“施工单位已挖掘到的黄色土夹砾石层应是第⑫文化层”^[9]。

第四,《简报》描述第⑫层,黄色沙质土含大量砾石^[10]。

这些描述虽然各不相同,但第⑫层应该是以黄色沙和砾石为主,包含大量陶片、动物骨骼和石器。从《报告》彩版二之 2“ 区发掘现场”T21 可以看到大量的砾石堆积,且粒径大小较为一致;从《报告》彩版四之 3“ T19 木构件堆积”T19 西壁可见大量砾石堆积(注:原报告图版照片左右翻转);从《报告》彩版五 T22~ T40 木结构建筑遗迹的关键柱上,可看到一层明显的叠瓦状堆积的砾石层(图二)^[11]。

结合图与文字描述可以看出,第⑫层堆积实际上是以沙为基质的叠瓦状结构砾石沉积,而叠瓦状结构的砾石层是冲积相沉积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河流中,较粗大的砾石多是以推移搬运。砾石一般呈椭球形或长圆形,它们在河水推动下,其长轴总是垂直水流方向,并沿河底向前移动。一旦水流推力减小时,它们就停积下来,砾石的最大扁平面向河流上游,并呈叠瓦状排列。”^[12]

如果不局限于第⑫层,结合其上的第⑨~⑪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十二桥遗址堆积的形成。以下是《报告》对这几层地层的描述。

区 T22 探方对这几层的描述如下^[13]。

第⑨层:浅黄色土,含黄色粗沙,包含少许陶片,呈小颗粒状,很碎,器形难辨。

第⑩层:浅灰色土,含微量细沙,土质较

疏松。

第⑪层:浅黄色土,含沙少许,土质较疏松。

区 T30、T40、T50(T40 在 T22 西面,T30 在 T40 之南,T50 在 T40 之北)地层堆积描述如下^[14]。

第⑨层:浅黄色土,含有黄沙,土质疏松。

第⑩层:浅灰色,土质黏性且含微量细沙。

第⑪层:浅黄色土,含沙少许,土质较疏松。

区的地层与 1987 年《简报》所选取的是同样的剖面,不过描述上有区别,如下^[15]。

第⑨层:浅黄色沙质土。

第⑩层:浅灰色黏土。

第⑪层:浅黄色沙质土。

从上文可知,《报告》中不同的地方对第⑫层土质和土色的描述并不一致,《报告》与《简报》对 区 T30、T40、T50 的描述也有较大差异。考虑到《简报》发表于 1987 年,撰写者对发掘现场的印象仍然很深刻,而整理《报告》的时候,印象已平淡,《简报》中对土质和土色的描述可能更可信。第⑨、⑪层堆积基质为沙,第⑩层为黏土层,第⑫层堆积为沙质砾石层,砾石磨圆度好,可见叠瓦状结构。第⑩~⑫层堆积从下到上,沉积粒度由粗到细,恰好构成一个垂向沉积分选明显的正旋回结构。第⑨层堆积含粗沙且陶片碎小,也属于典型的冲积相沉积,但第⑨层堆积的粒度粗于第⑩层,因此与第⑩~⑫层不属于同一旋回,而是一个新的沉积过程。所以,第⑨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夹沙砾石、砂层和黏土依次沉积的结构(分别对应沉积剖面中的砾岩、砂岩和泥岩),多见于辫状河河床的垂向沉积,如长江中游武

汉市阳逻镇长江北岸半边山、阳逻电厂一带为“辫状河特点的河流沉积”^[16]。辫状河河床沉积的特点是垂向沉积的分选性好。从大环境看,十二桥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为典型的冲洪积平原,构造基础为成都凹陷,形成于中生代。正是第四纪以来岷江、沱江的冲积洪积碎屑,塑造了今天的成都平原的自然地貌。成都平原由一系列的冲积扇构成,其中最大的是岷江冲积扇,而岷江出玉垒山口进入成都平原后,河道游荡不定,形成了支系复杂的辫状河。

冲积扇从扇根到扇端,主要分为“泥石流沉积、筛状沉积、漫流沉积和辫状河道沉积”^[17],其中“在中部及端部组成由粗向上变细的层序组合,即砾岩—砂岩—泥岩的沉积剖面”^[18]。

第⑩~⑫层的堆积特征与河漫滩的沉积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河漫滩相堆积通常为二元结构,上层为河漫滩相冲积物,由洪水期环流从河床中带到河漫滩上,主要是细沙和黏土;下层为河床相冲积物,由洪水期河床水流最强部分堆积,称蚀余堆积,随着洪水期河床的侧移,蚀余堆积逐渐被河床浅滩堆积物覆盖而形成河床相物质上细下粗的沉积结构。河漫滩冲积物是洪水期在河床相冲积物之上堆积的近于水平的细沙和黏土。河漫滩冲积物和河床冲积物是河流发育同一阶段形成的冲积物的两个不同的沉积相。”^[19]

第⑩~⑫层堆积结构呈现出冲积相的特征,但第⑬层为干栏式建筑,即使可以伸入河道,但也不能伸入太远,同时⑩层的堆积显示出漫滩相的特征,所以十二桥遗址F1的位置应该在河滨。第⑫层堆积中的大量砾石应该是洪水携带而来,并由于洪水期水位的增高,十二桥遗址被借为河床,流速减缓后,部分砾石停止移动,并在流水的作用下成为稳定的叠瓦状结构。从图二之3“T30关键柱北面砾石堆积状况”可以看出,磨圆度较好的砾石长轴向西倾斜,说明西边为来水方向。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对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过程进行假设复原:十二桥遗址第⑫层包含的大量砾石应该来自一次搬运力极强的洪水。

而这次洪水很可能是F1毁弃的主要原因,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F1毁弃在第⑫层砾石层形成之前。在洪水达到峰值之前F1就已倒塌,在洪水到达峰值时,携带来大量的砾石和沙,峰值之后,洪水携带的大量砾石因流速减缓沉积,形成叠瓦状结构,掩埋了F1的建筑构件,随着流速的进一步减缓,河水携带的悬移质粗沙也沉积下来,形成第⑪层,最后,比重最轻的悬移质细沙和黏土覆盖在第⑪层之上,形成第⑩层。

F1虽被冲毁,但主体结构和屋顶茅草仍散布周围,随即被冲积层覆盖,并借河水密封绝氧,得以保存。设若第⑬层与第⑫层的时间间隔哪怕是仅几年的时间,风吹日晒,木头即使未朽坏殆尽,茅草屋顶又如何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F1较好的保存状态支持其为一次突发事件后的快速埋藏。

四 F1复原结构的质疑和假设检验

《报告》中将F1复原为一个T形结构的干栏式建筑,由一排正房和一侧廊道构成。从我们对成都平原建筑结构的了解看,成都平原干栏式建筑并非主流。成都平原通常情况下使用的是建在平地、以柱子为承重支撑的土木结构房屋。现代的成都平原或者沿河城市,仍然存在现代的干栏式建筑,这些建筑一般滨河而建,部分基础甚至可以伸入到河床中。

根据第⑩~⑫层的堆积特征可知,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呈现出河床或者辫状河漫滩相堆积特征。如果第⑫层是河床大幅摆动所致,那么第⑬层一定会被破坏,而我们看到的F1残存结构和出土器物都相对完整,说明十二桥遗址应该位于当时的河滨。

F1正房和“廊道”除了位置相近,其建筑结构和用材存在较大的差别。首先,廊道的用料粗于正房,但制作十分粗糙。二者组成的T形布局,在古建筑中也极为罕见。与其别扭地把二者毫无根据地连为一体,不如先把二者分开分析。

“廊道”由作为基础结构的横木(类似于火

车轨道的枕木),和其上的纵向铺设的木材(类似于火车轨道的铁轨)构成,横木用材粗于正屋的基础,但是粗细不一,形状多就原形,修整粗糙。“廊道”的用材显示出较好的承重能力和不讲究的特征。考虑到十二桥遗址位于河滨,“廊道”的结构更像是伸向河道的一座码头。

如果 F1 是一座滨河而建的干栏式建筑,那么它的长轴应该与河道平行。上文中从 T30 的砾石长轴倾斜方向分析,判断来水方向为西面,F1 长轴如与河道平行,则 F1 西面为来水方向。F1 长轴为北偏西 42° ^[20],即西北为来水方向,与《简报》所言“许多构件恰均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倒塌”^[21]一致。

再看如果 F1 是滨河干栏式建筑,那么洪水期间水位上涨,河滨位置(漫滩)借为河道。F1 的完整和第⑫层的冲积相沉积则不会矛盾。

但是洪水可以携带来那么多的砾石,为何 F1 的大部分建筑木构件没有被冲走?

从 F1 的残存结构和复原结构来看,F1 是通过竹篾连为一体,并且是木骨为墙的结构。通常木骨不会单独构成墙体,而是木骨泥墙的结构,与同遗址第⑧层下的 F3 为竹骨泥墙相类。从 T30 剖面测量得到的砾石长轴长 4~5 厘米,厚约 3 厘米^[22],洪水并没有携带巨石。而如 F1 这样大体量的木骨泥墙即使木头比重较轻,虽然被洪水冲垮,部分散件随水冲走,但部分尤其是基础部分并不会被洪水冲走。

F1 留存的木结构固然非常珍贵,但是大面积保存的茅草屋顶,在考古发掘中是非常少见的。如果十二桥遗址位于河滨,通过河水对河岸的补充,十二桥遗址的木构件常处于饱水的

环境中,河水以及漫滩的黏土堆积才是真正起到空气隔绝的最根本因素,才是这些遗迹得以保存的决定性因素。

五 早期地层包含物提供的辅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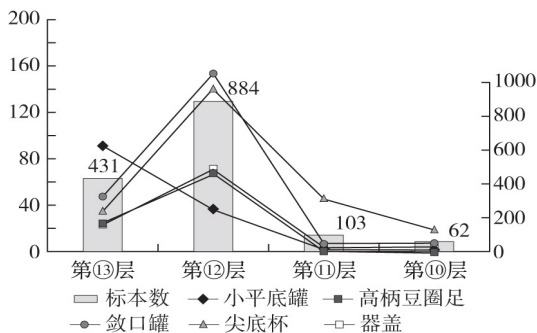
十二桥遗址的第⑨~⑫层实为自然堆积,虽然包含大量的文化遗物,但并非考古通常认为的“文化层”。这一点不仅能从沉积结构上予以说明,结合各层中出土的遗物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

对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第⑩~⑬层)进行分期,是所有研究四川先秦文化的学者必须探讨的问题。《简报》最先进行分期,分为三期,分别是以第⑬层为代表的早期,第⑫层为代表的中期和第⑩、⑪层为代表的晚期。孙华也分为三期,分别是以第⑬层为第一期,第⑪、⑫层为第二期,第⑩层为第三期^[23]。宋治民同意《简报》的分期,但认为十二桥遗址早、中期年代接近西周后期,晚期为春秋时期^[24]。后来根据尖底器的类型分析,认为第⑫、⑬层为西周后期,第⑩、⑪层为春秋时期^[25]。《报告》分为早、晚两期,即第⑫、⑬层为早期,第⑩、⑪层为晚期^[26]。江章华将第⑫、⑬层定为十二桥遗址一期早段,第⑩、⑪层为一期晚段^[27]。可见十二桥遗址的分期引起了学术界的分歧,学者们在分期时主要根据器物组合和典型器物尤其是尖底器的演变,部分学者在分期时参考了地层描述。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差异的客观存在,尤其是器物组合上的巨大区别,让学者最终将划分的焦点集中在遗物较多、组合相近的第⑫、⑬层和遗物少、组合相近的第⑩、⑪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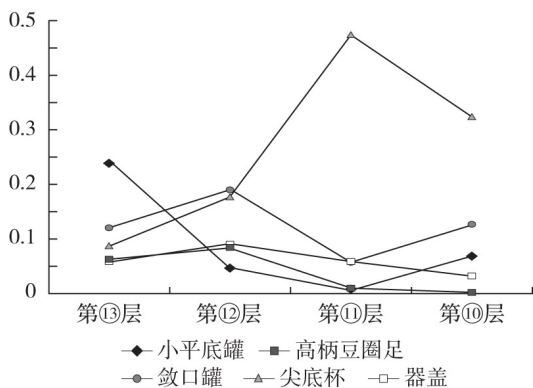
表一 十二桥遗址典型器类统计表

地层	小平底罐	高柄豆圈足	敛口罐	尖底杯	器盖	小计	可鉴定陶片数	尖底杯(%)
第⑬层	103	27	53	38	26	247	431	8.8
第⑫层	40	75	172	155	80	522	884	17.5
第⑪层	1	1	6	49	6	63	103	47.6
第⑩层	4	0	8	20	2	34	62	32.3
总计	148	103	239	262	114	866	1480	17.7

说明:统计之前先进行拼对,以能拼起来的最大部分为1个单位进行统计。



图三 典型陶片与可识别陶片数量图



图四 典型陶器占可鉴定陶片比例变化图

《报告》出版后，逐渐有学者意识到，第⑫层与第⑬层的共时性是可以讨论的^[28]，施劲松撰文指出“十二桥遗址可能受到洪水冲击，地层中的陶器会由此受到扰乱。十二桥遗址也未发现包含陶器的灰坑等遗迹，因而仅以可能受扰动的地层中出土的陶器来讨论遗址的分期和时代是有其局限性”^[29]。

《报告》中的“商周时期陶器器类统计表”^[30]对属于商周时期的第⑩~⑬层出土的可识别器形的陶片进行了统计(表一)。为了看清陶器在这4层地层间的变化，我们将可识别器形的陶片总量以柱状图的形式来表现，并叠加统计数量超过100的5类器物的数量变化折线图(图三)。

这5类器物是小平底罐、高柄豆、敛口罐、尖底杯和器盖。其中高柄豆由于豆盘、豆柄、圈足分开统计，为了避免重复计算，选择了统计数量最多的高柄豆圈足作为高柄豆的数据代表。《报告》编写者将陶器分为了A、B两群，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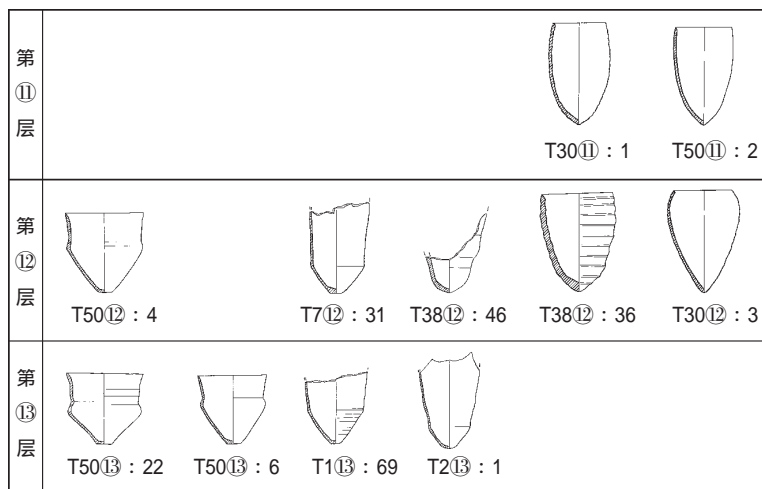
认为“A群陶器属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而B群陶器基本不见于三星堆文化”^[31]，并认为A、B两组陶器群的划分是“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的区别所在”^[32]。选取的5类器物中，小平底罐和高柄豆圈足^[33]属于A群，敛口罐、尖底杯属于B群，器盖非A非B。从图中可以看出，除小平底罐外，其余4种器物都是第⑫层最多，第⑩层和第⑪层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

除了陶片，我们来看动物骨骼。第⑬层的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出土在T30中，第⑪层的动物骨骼主要出土于T43，第⑩层主要出于T54中，而第⑫层动物骨骼遍布地层。从数量来看，第⑬层可鉴定动物骨骼数量为10个，第⑫层为821个，第⑪层为5个，第⑩层为9个。可以看出第⑫层可鉴定动物骨骼数量是其他3个地层之和的34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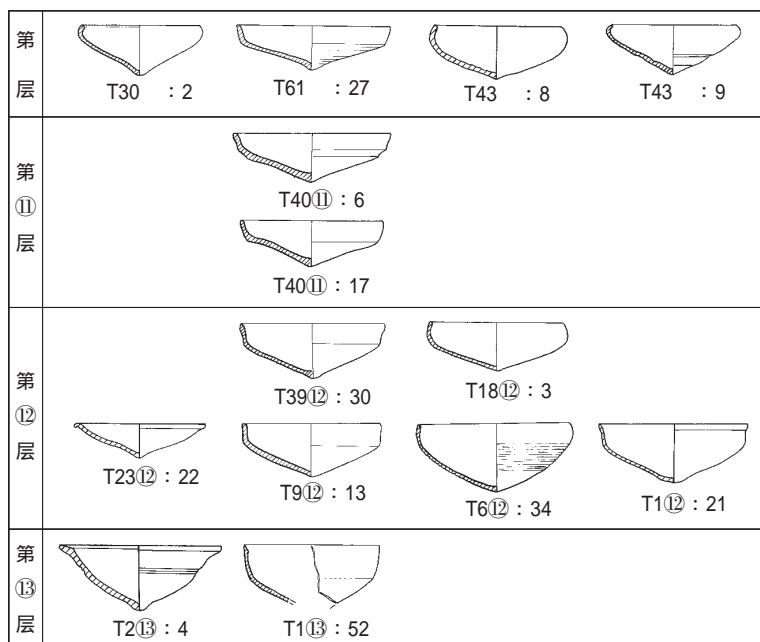
从第⑩~⑬层所出陶片和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可以看出，第⑫层堆积包含文化遗物异常丰富，而第⑩、⑪层可鉴定陶片数量逐层减少。仔细分析数据，会看到尖底杯的数值非常奇特，尖底杯的绝对数量也是从第⑫层开始向上逐渐减少，虽然这个减少与可鉴定陶片数的减少趋势一致，但比例却大不同。这4层尖底杯在可鉴定陶片数比例的平均值为17.7%。第⑬层尖底杯比例为8.8%，文化遗物数量最多、最具有统计参考意义的第⑫层出土尖底杯的比例为17.5%，但是尖底杯在第⑪层可鉴别陶片总数的比例高达47.6%，而第⑩层则达到32.3%(图四)。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或者成都平原上的其他遗址，从未出现过如此高的尖底杯比例。

为什么第⑩层和第⑪层的尖底杯比例会如此之高？尖底杯和我们探讨的其他4种器类相比有何特殊之处，造成了这种大比率的失衡？

尖底杯是这5类器物中制作最精致的器具。尖底杯的质地多为泥质或夹细砂陶，器壁很薄，在所有的器物种类中比重最轻。所以，在流水的分选作用下，夹砂、粗笨的器物大量在第⑫层沉积，而质地轻薄的尖底杯在第⑩、⑪



图五 尖底杯



图六 尖底盏

器类的统计说明了各层遗物的总体特征，但作为考古研究，还需要关注出土器物的类型，检验第⑩~⑬层是否存在地层由下到上、遗物由早到晚的顺序。这4层出土的器物是否存在大的年代差距，并且这种年代差距和堆积的先后相关。因为洪水沉积不能智能地分选器物，把年代早的沉积在下面，年代晚的沉积在上面。所以，检验第⑩~⑫层是否为洪积层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来自这4层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尤其是对第⑫、⑬层出土器物的分析。因为第⑩、⑪层的包含物较少，存在一定的随机性。

我们对十二桥遗址器物最全面的认识，还是来自《报告》的“商周时期陶器器类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第⑫层的器类、器型最为丰富，其下的第⑬层和其上的第⑩、⑪层器类和器型都未出第⑫层范围。从大的器类来看，第⑬层有的器类，第⑫层也有。而第⑫、⑬层有的器类，第⑩、⑪层未必有，例如花边口沿罐、瓶、盘、觚等。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是这4个地层在出土器物总量上的明显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数量较少的非主流的器物可能会随机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分析的重点仍然在于这4层共有的大宗器物。

首先是小平底罐。从发表的器物线图来看，来自第⑬层的小平底罐占绝对优势。《报告》共发表了27件小平底罐线图，第⑬层发表22

层比例畸高。

同时，虽然《报告》没有关注第⑩~⑫层出土陶器的破碎度和陶片大小，但从《报告》选择发表的线图来看，绝大部分线图的标本来自第⑫、⑬层，少量来自第⑪层，极少来自第⑩层。除了第⑩、⑪层器物数量较少的原因外，可能也与出土器物比较破碎有关。因此，从文化遗物的出土情况看，也与我们之前根据第⑩~⑫层的沉积结构得出的推论吻合。

首先是小平底罐。从发表的器物线图来看，来自第⑬层的小平底罐占绝对优势。《报告》共发表了27件小平底罐线图，第⑬层发表22

件(20件完整或可修复,2件残件),第⑫层发表完整器3件,第⑪层发表完整器1件,第⑩层发表残件1件。而从《报告》的“商周时期陶器器类统计表”^[34]看,式应该是小平底罐构成主体。第⑬层式占11.7%、式占85.4%,第⑫层式占10%、式占87.5%,比例也非常接近。而式内的器型差异就比较大,部分器物已有尖底的意味,如式T49⑬:15和式采:6。小平底罐中能构成式别差异,似乎可决定年代早晚的器物,恰恰数量较少且不典型。同时可以从《报告》发表的线图看,第⑬层出土小平底罐的器型丰富,有肩的、无肩的,直口的、侈口的,双腹的、普通的。第⑬层所出小平底罐的差异大于第⑫层的差异,并且相互间缺乏脉络清晰的演变轨迹。

从介于小平底罐和典型尖底杯之间的高领小平底罐(即《报告》中的Aa型尖底杯)来看,第⑫、⑬层都既有圆肩的,也有折肩的,未见明显差异。尖底杯在4个地层中的数量都比较多。第⑫、⑬层部分尖底杯的底部仍然有个小平底,虽然不见得能平稳放置。第⑬层的尖底杯是折腹、小平底,而第⑫层除了折腹、小平底的尖底杯外,还出现了敛口、最大径近口部,下腹急收,从肩直接斜收到底。第⑩、⑪层出有式炮弹形尖底杯,这种尖底杯相较于其他尖底杯,器身稍小,器体轻薄,大量出土于第⑩、⑪层(图五)。

尖底盏是十二桥遗址商周时期的另一类典型器物,但数量不多,共有24件,大致可以分为侈口、直口和敛口三类(图六)。第⑫、⑬层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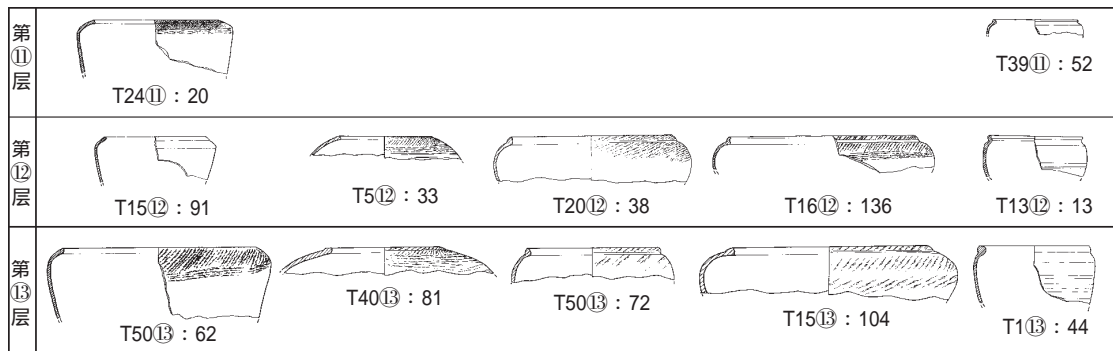
出现了侈口和直口尖底盏。其中侈口尖底盏自成一类,数量仅有2件,第⑫、⑬层各1件。敛口尖底盏的演变趋势是最大径上移,直口尖底盏是器身变矮,同时尖底部分内曲。但这些观察到的规律没有大量统计的论证,而仅有少量的器物支撑,是个体器物的差异还是一种变化的趋势,还待进一步讨论。

敛口罐的总量虽多,但仔细看图,会发现器类复杂,大小悬殊,其型、亚型间有较大差异。其中特征最清晰的A型,敛口、圆肩,最大径在肩部。在肩部、沿外或沿面拍印绳纹装饰,数量也最多,有124件。如T50⑬:62和T24⑪:20在形态上就非常接近。未起领的敛口罐中,同是加厚唇,T50⑬:72与T20⑫:38相似,而T16⑫:136整体与T15⑬:104相似,唯在唇内侧修出一道凹槽(图七)。

通过上文对十二桥遗址早期地层4种典型器物的分析,我们发现除了器壁薄、器形小、比重轻的尖底杯在型式上随地层堆积有所区别,尖底盏微有变化外,小平底罐、敛口罐则看不出明显的演变。小平底罐和敛口罐在第⑫、⑬层的数量多、型式多,数量多少和器物形态的丰富程度相关。

六 结 论

通过上文对十二桥遗址早期第⑩~⑫层的堆积结构、木构件特征与分布、出土器物统计以及部分典型陶器型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第⑩~⑫层可能是辫状河漫滩的自然分层堆积。十二桥遗址本身为一处滨河遗址,F1为河



图七 敛口罐

滨的河房,“廊道”可能是伸向河床的码头,洪水冲毁 F1 后,F1 垮塌形成的原生堆积第⑬层,第⑬层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最多。洪水携带的沙石和来自附近聚落的日用品、生活垃圾等随着洪峰消退、水流缓慢率先沉积形成以沙为基质的叠瓦状砾石结构并包含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等的第⑫层。随着洪峰的消退,流量进一步减少、流速进一步减慢,流水中携带的悬移质中较重的沙开始沉积,形成沙质土的第⑪层,包含少量陶片,完整器多为小型器,以器形轻薄的尖底杯和尖底盏为主。第⑩层沉积粒度更小,以黏土为主,含少量细沙,包含更少的陶片,完整器以器形轻薄、较小的尖底盏为主,第⑩层可能有晚于第⑪、⑫层的器物沉积并陷入。第⑨层包含粗沙,陶片碎小,为河床或者漫滩沉积,第⑨层的形成与摧毁 F1 的洪水事件无关,所出的完整器与第⑧层接近,应是第⑧层器物沉积后下陷所致。第⑨~⑫层为受流水搬运作用形成的次生堆积。第⑨~⑪层下均无人类活动的遗迹,可为辅证^[35]。

整体来看,十二桥遗址的商周时期堆积代表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青铜社会。相同地层内相似器物的细节差异大于地层间的差异。商周时期十二桥遗址的陶器仍然是手工制品,器物的丰富程度与器型的差异程度相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第⑩~⑬层出土器物的组合差异,以及尖底杯和尖底盏在第⑩~⑬层之间的型式差别,就会意识到将这种差别完全归因于时代差别是非常危险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仅是十二桥遗址自身的堆积结构和出土遗物能说明这个遗址经历了洪水和河道的变化,它周边的指挥街遗址第⑤A、⑤B、⑥层和所谓的生土都是冲积相沉积。第⑤A、⑤B层为沙层,第⑥层和生土层为沙砾层。第⑥层虽然没有剖面照片,但从地层剖面示意图看,其结构为以沙为基质的砾石层,与十二桥遗址第⑫层相似;出有大量的陶、石、玉、骨器和卜甲、人骨、兽骨、朽木等^[36],包含物种类及年代与十二桥遗址第⑫层基本同时。这两个遗址的地理位置相近,指挥街遗址

的堆积结构与河床相似,第⑤B层应该是多次洪水扰动的堆积,形成十二桥遗址第⑨层的那场洪水可能也参与其中。指挥街第⑤B、⑥层出土器物的年代更加混杂,少量晚期器物甚至扰入第⑥层中。而十二桥遗址早期堆积结构与漫滩更接近。指挥街第⑥层砾石的来源倾向于与十二桥遗址第⑫层相同。而作为岷江冲积扇的扇缘地带,商周以来大比例砾石沉积并不常见,“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十二桥遗址与指挥街遗址可能与同一条河有关,指挥街遗址早期所在地质环境为河床,十二桥遗址早期所在地质环境为漫滩。十二桥遗址的第⑩~⑫层和指挥街遗址第⑥层砾石的来源很可能一致,二者是同一大洪水事件形成的沉积。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成都十二桥》,第2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2] 同[1],第19页。
- [3] 同[1],第19页。
- [4] 同[1]。
- [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 [6] 于孟洲、夏微《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成都十二桥〉读后》,《考古》2013年第6期。
- [7] 同[1],第13页。
- [8] 同[1],第16页。
- [9] 同[1],第5页。
- [10] 同[5]。
- [11] 同[1],彩版二、四、五。需要说明的是,彩版四之2、3(T18、T19)与彩版一对比看,照片在排版中出现了左右翻转的现象。
- [12] 汪新文《地球科学概论》,第94页,地质出版社,1999年。
- [13] 同[1],第12~13页。
- [14] 同[1],第16页。
- [15] 同[5]。
- [16] 梅惠等《长江中游阳逻砾石层沉积环境分析》,《第四纪研究》第29卷第2期,2009年3月。
- [17] 何幼斌、王文广《沉积岩与沉积相》,第166页,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
- [18] 同[17],第164页。
- [19] 杨景春、李有利《地貌学原理》,第31页,北京大

- 学出版社,2001年。
- [20] 根据《报告》图一〇“十二桥商代木建筑(F1)基础复原结构图”测算。
- [21] 同[5]。
- [22] 图中为T30的关键柱,关键柱宽1米,以此为比例测量砾石长轴的长度。
- [23]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 [24]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年第5期。
- [25] 宋治民《蜀文化尖底陶器初论》,《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 [26] 同[1],第130页。
- [27] 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成都考古研究(上)》,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8] 同[6]。
- [29] 施劲松《十二桥遗址与十二桥文化》,《考古》2015年第2期。
- [30] 同[1],第133~135页。
- [31] 同[1],第133页。
- [32] 同[1],第133页。
- [33] 高柄豆的统计分为豆盘、豆柄和圈足三部分,为避免重复,以数量最多的圈足代表高柄豆的数量。
- [34] 同[1],第133页。
- [35] 《简报》在描述第⑨层时描述了F3竹骨泥墙建筑,但《报告》认为竹骨泥墙建筑为第⑧层下建筑。此处当从报告。
- [36]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 (责任编辑:王霞)

· 新书推荐 ·

濉溪石山孜 ——石山孜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淮北市博物馆 编著
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1992~199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后两次对位于安徽省濉溪县的石山孜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书主要介绍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对发现的房屋、灰坑、墓葬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遗物进行了整理和分类,根据地层叠压关系、陶器的形态演变及组合情况,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遗存做了初步分期研究。报告分七章,正文之后附录了关于该遗址出土动物遗骸、骨器、石器方面的专题研究。该报告为研究安徽省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和淮系古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文物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大16开 精装 定价540元